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俄羅斯在普丁時期對東南亞的政策走向以及雙邊的關係。爲鋪陳俄羅斯政府在制定對東南亞政策的背景，本論文以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巴契夫，及俄羅斯聯邦兩位總統葉爾欽和普丁的亞太政策作爲區隔方式，將冷戰前後俄羅斯（及前蘇聯）的亞太政策詳加歸納和分析，尋找出其對東南亞政策的核心價值和彼此的相連性。

經過大量的文獻探討及分析後，本文的研究得出三個具體的結論：

一、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各任政府根據冷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國內政治經濟的需要對亞太戰略進行大幅度的調整，將亞太地區定爲冷戰後俄羅斯謀求海外經濟利益和提高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重要區域之一。

二、冷戰結束後，蘇聯瓦解。蘇聯過去基於扶植東南亞的親蘇政權而採取的政策已不合時宜，作爲亞太政策一部分的東南亞政策，自然亦須加以調整。東南亞地區不僅戰略地位重要，自然資源也十分豐富，並且是一個正在興起的龐大市場，這些優越條件皆迎合了普丁大力推行經濟外交政策的目標，此爲俄羅斯與東南亞展開新關係提供了契機。因此，筆者認爲，在俄羅斯（及前蘇聯）長期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過程當中，國際體系變化、國內政經情勢走向、以及俄羅斯對外決策考量皆對俄羅斯東南亞政策的形成有深切之影響，其中又以俄羅斯經濟利益及發展因素對外交政策走向的影響最大。

三、2000 年普丁掌權後，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發展趨勢下，俄羅斯極希望通過加強與東協國家經貿合作關係，以進入亞太區域的經濟體系，並以之作爲加入「世貿組織」（WTO）的重要跳板。同時，俄羅斯希望利用東協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區的合作機制，來振興國內遠東和西伯利亞經濟的發展；而且試圖在東南亞地區開拓能源貿易及合作機會，以增強東南亞國家對俄國能源的依賴和強化合作。普丁政府務實的外交政策，基於商業利益，也力求打開東南亞巨大的軍火市場，擴大武器出口，以賺取大量外匯，兼能拉近俄羅斯與伊斯蘭國家的關係，這對俄羅斯解決車臣問題以及確立在全球反恐體系中的地位都大有好處。

綜合本文前四章所述，在冷戰的政經格局底下，蘇聯對東南亞的政策主要是，企圖經由輸出共產主義、建立親蘇共產政權的方式，以擴展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蘇維埃政府透過經濟與軍事援助的計劃，展開扶植馬列主義附庸國的策略。這項

政策成功地應用到越南這一東南亞國家上。因此，在兩極對抗時期，蘇聯主要與中印半島上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密切關係，謀求與這些國家共同推行「反華政策」，以防止它們與中共結成反蘇同盟；同時對於親美反共的東協則保持距離。

直至戈巴契夫 1985 年擔任蘇共總書記後，重新檢討了蘇聯內外的政策，體認到光憑軍事手段不僅無法取得東南亞各國的信任，同時還會因經援盟國，導致自己停滯不前的經濟雪上加霜。爲了推行其「加速發展戰略」的新經濟措施，蘇聯加緊開發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希望通過與東協加強經貿關係，有助於克服其經濟難題。在戈巴契夫的「新思維」外交指導原則下，蘇聯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才逐漸獲得改善。

然而，在蘇聯解體、中東歐共產政權變天，全球彌漫一片和解氣氛的狀態下，獨立初期的俄羅斯基於國內民主政治的建立與經濟改革的需要，毅然決定向西方國家靠攏，一時之間「大西洋主義」氣息濃厚，俄羅斯對外政策的總體方針是力求早日加入「西方文明世界的大家庭」，建立「從溫哥華到海參崴的歐洲－大西洋大家庭」，爭取西方對俄羅斯實行「馬歇爾計劃」式的援助。[1]

俄羅斯在外交上奉行親西方政策，自然也就降低了越南在俄羅斯外交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對的，蘇聯巨變以後，由於越南堅持採行社會主義制度，再度遭受西方國家打壓，加上越南對俄羅斯建國後採取全盤西化政策而深表不滿，因此俄越兩國關係在 1991 到 93 年間呈現停擺狀態。由於轉型初期的政經混亂和向西「一面倒」的政策，葉爾欽政府初期對東南亞地區關注不多，而東協國家亦對其採取保留及觀望的態度，雙方在此時期的關係，雖然不如冷戰時期的低落，但進展不大。

不過，親西方的外交政策和以「震盪療法」進行激進改革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來，並在國內引起普遍反對，加上西方對俄羅斯的援助大多口惠而實不至，而且經常將援助與其他政治問題掛勾。國內政局混亂不堪，居民生活水準一落千丈，國家利益蒙受重大損失，俄國國際威望和國際地位急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大西洋主義」的外交政策遭受社會各層面的嚴厲指責。於是，佔據俄國主流的外交思想逐漸轉移，「現代斯拉夫主義」和「新歐亞主義」等思潮表現出更大的號召力。在保守勢力堅持恢復大國地位、維護國家尊嚴的原則下，1996 年開始俄羅斯的對外政策出現大幅度的轉變，普里馬科夫取代科濟列夫擔任俄國外長，積極推行獨立自主的東西並重的「雙頭鷹」外交政策。

爲了謀求國家穩定、恢復強國地位，以及經濟發展，普丁 2000 年上台後，開始對外交政策大作調整。他主張在處理國際事務時，既要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同時也要

[1]李靜杰、鄭羽，*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頁 87。

靈活變通，並且注重實際效果。在 2000 年通過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中明確指出，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原則是建立在「使其目標與落實目標的可能性保持合理平衡」基礎之上，因此普丁的對外政策是比較實際與務實。[2] 普丁認爲，制定外交任務時，應視其是否符合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實際需要，參與國際事務應當考量其是否真的有助於增強或提升國家的地位。在這種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下，俄羅斯逐步形成了它的亞太政策，其中包括對東南亞政策的調整。從最初在東南亞地區的退縮，逐漸改爲積極參與該地區的相關事務及發展全方位的關係，究其原因，主要包含地緣經濟及安全戰略等兩項因素。

在普丁政府的亞太總體策略下，強調俄羅斯與目前經濟活躍的東南亞國家必須「建立正面且有活力的關係」；尋求貨品市場，特別是開拓軍事市場，擴大武器出口以賺取大量的外匯。因此，隨著普丁調整對東南亞的政策，以及大力推行「經濟外交」，俄羅斯開始積極加強與東協的經貿關係，除了加強與東南亞的傳統盟國，重建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合作關係外，還與其他傳統邦交國拓展經濟、政治及軍事等方面關係。一方面吸引大量的外資及技術，促進國內的經濟穩定及發展；另一方面，藉由能源合作加速融入東協乃至整個東亞區域的經濟區域化和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進程，以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及保持亞太區域均勢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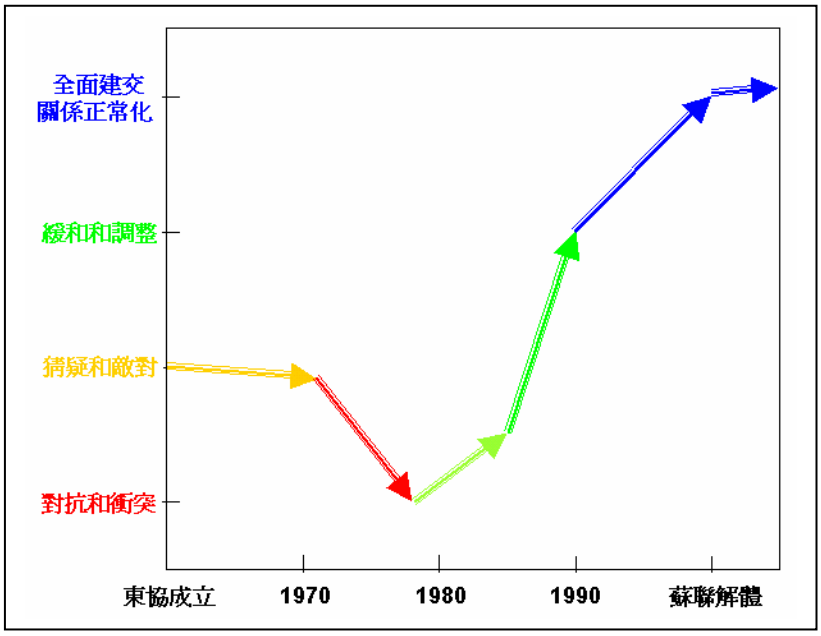
事實上，東南亞國家與前蘇聯在早期就建立了外交關係，只是侷限於意識形態，雙邊關係並不密切。冷戰結束後，俄羅斯與東南亞諸國全面建交及關係正常化，意識形態不再是雙邊關係中的負面因素。在雙方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遂由對抗走向合作。

借助於歷史的慣性和理性的判斷，俄羅斯與東南亞關係的發展並非無徑可尋。在冷戰結束初期，東南亞部分國家曾積極欲與俄羅斯建立較密切的聯繫，但由於俄羅斯國內政經混亂以及重視西方的外交政策，東南亞與俄羅斯的關係進展不大。作爲一個大國，俄羅斯此時在亞太和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已退到美國、中國和日本之後。由於國際政經環境的變化，以及雙方的利益考量，俄羅斯與東南亞的關係變得遠離。因此，雙方的實質關係大多是從 21 世紀普丁執政才開始，其過程是，首先進行高層官員互訪、簽訂聯合公報、協定和條約，然後便展開雙邊各項實質的合作關係。合作的項目主要在軍火交易、能源、科技合作，以及打擊恐怖主義等政策。最後，由於雙方建立實質關係時間尚短，所以至今雙邊貿易額不大，但在將來應該有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2] Margot Light, “Foreign Policy”, p.240.

其次，本文也探討俄羅斯與東協關係。在冷戰時代，多數東協國家都向美國靠攏，蘇聯與東協國家關係因而經歷了高低起伏；雙邊的實質關係主要是從 1990 年代後才逐漸展開。觀察蘇聯與東協關係的發展，其間的過程雖複雜曲折，然亦有其脈絡及軌跡可循（可概以圖 5 顯示），且在雙方關係由敵對而衝突、由衝突而緩和、由緩和而調整再至化敵為友全面建交的變化中，亦存在著影響雙邊關係的關鍵因素。

圖 5 、前蘇聯與東協關係發展軌跡



發展俄羅斯與東協的合作關係，是雙方共同的願望。東協國家近 10 年來對俄羅斯的信任不斷增加。通過雙方長期及堅持不懈的努力，一些原本對俄羅斯持懷疑態度的國家也開始改變立場，雙方在許多重大的區域與國際問題上互相支持。2004 年 11 月 28 日在「東協高峰會」召開之際， 俄外長拉夫羅夫代表俄羅斯到寮國首都永珍參加了俄羅斯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AC，又稱 1976 年巴里條約）的簽約儀式。普丁同意簽署加入這一個東協互不侵犯協定，除了能夠大幅度加強俄羅斯與東協關係的政治和法律基礎外，並為俄羅斯翌年出席馬來西亞首都舉辦的「第一屆俄羅斯－東協高峰會」鋪平了道路。

普丁政府執政之七年來，對東南亞之政策，比起其前任政府可說大有作為。自普丁上任以來，俄羅斯政府開始積極對東協加強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領域的全面交往。在 2005 年，雙邊關係臻於高點。雙方簽署的「發展全面夥伴關係聯合宣言」、「推動雙邊自 2005 年至 2015 年全面合作的行動計劃」以及「雙邊經濟和發

展合作協議」等三項重要文件，反映著雙方關係更具有實質性，也標誌著普丁對東協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成果。

筆者在梳理俄羅斯對東南亞政策的背景原因時，發現地緣經濟的影響力的確存在。綜觀戈巴契夫、葉爾欽和普丁政府對亞太地區的總體政策，可以察覺，俄羅斯對東南亞政策是從屬於俄羅斯的亞太戰略，也是冷戰後俄羅斯亞太政策重要的一環。俄羅斯亞太戰略的經濟目標，是謀求亞太諸國支持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和吸取外資促進東部地區的開發。作爲一個國際組織的東協，它在亞太區域主義中扮演主導角色，主導「亞太經合會」和「東協區域論壇」等機制。爲了確保本身在亞太經濟整合過程中佔有一席地位，俄羅斯必然會尋求東協的支持。

此外，東協是世界上經濟增長較快的區域之一，成爲一個具有很大潛力的市場，區域影響力也將相對地擴大，俄羅斯爲了確保它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利益，將不會輕易放棄這片市場。軍火交易一直是俄羅斯國防工業的主要收入來源。在經濟復甦的形勢下，東協各國皆考慮更新軍事裝備。特別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東協諸國紛紛以反恐名義，提高軍費預算，購置先進的武器。普丁採取各種手段積極開拓東南亞的軍火市場，以賺取大量的外匯，這與東協國家要加強海空力量以及尋求軍火供應商多元化的想法不謀而合。

俄羅斯地緣政治的獨特特徵，使其必須重視遠東和西伯利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21 世紀，亞太地區尤其是東協在區域整合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多邊合作機制也日趨成熟，俄羅斯即時把握這一時機，盡可能的參與區域經濟整合的進程。如果說，1967 年東協的成立爲國際關係和亞太地區南部國家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力量的話，那麼，90 年代後的東協經濟區域整合的成就，爲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經濟的持久發展提供了新的契機。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的資源與能源，爲俄羅斯和東南亞的合作孕育巨大潛力。當然，這一合作的前景將取決於俄羅斯和東協的政治穩定和相互信任。[3]

近年來，俄羅斯與東南亞的關係經歷了很大的轉變。雙方出於經濟、政治、安全等多方面的考慮，加強了全方位的合作關係。雙方關係近年來的發展似乎都很順利，但是觀察俄羅斯和東南亞關係的發展前景，除了從雙邊歷史發展角度來思考彼此政策的調整以外，仍需要考慮雙方在當今國際和地區格局的情勢之下，如何以最大限

[3] 馮紹雷，相藍欣主編，*俄羅斯與大國及周邊關係*，頁 365。

度的「求同存異」來獲取各自最大的國家利益。茲將俄羅斯東南亞政策的前景列述如下：

（一）就經濟利益而論，東南亞各國經濟發展潛力龐大，合作前景廣闊。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和東協實行經貿合作，並主張外交服務經濟，有助於國家發展。但近年來，儘管俄羅斯經濟出現好轉，其制約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並沒有改善。俄羅斯內部投資環境欠佳與法治不嚴謹，造成俄羅斯與東南亞國家經貿投資額不大。正如前章所分析，儘管俄羅斯經改已久，但其生產水平依舊不高。除非引進俄羅斯高科技產品，一般消費品或輕工業產品的品質粗糙。除了價廉以外，市場誘因有限。另外，雙邊貿易商缺乏交流、資訊不流通等問題都有待雙方進一步改善。

（二）從地緣戰略角度觀之，普丁重視東南亞的地緣戰略地位。然而，俄羅斯與東南亞地區「戰略夥伴」們的長期發展方向，相當程度取決於美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的走向。東南亞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以及經濟成長迅速，已經成爲世界上不可忽視的政治和經濟力量，也是本區乃至世界的一支重要力量。爲了在這一重要地區佔據有利的地位，世界各強國如美國、日本及中國都在建立和調整對東南亞國家的戰略。由於歷史和傳統因素，美國與日本分別與東協關係，以及在東南亞地區的發展中都佔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對俄羅斯的東南亞政策以及雙邊關係的發展必將構成挑戰。此外，未來中國經濟與政治實力持續的成長，俄羅斯在東南亞地區的地位將面臨更多的挑戰。

（三）就整體而論，俄羅斯發展與東協的關係尤其是經貿往來，更多立足於亞太地區的大框架中進行。東協注重加強與俄羅斯的經貿和軍事技術合作。基於對世界和區域格局與未來趨勢的共同認識，基於對地區穩定和繁榮的共同訴求，俄羅斯和東協雙方都深切意識到，跟歐洲相比，亞太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存在著較多的不穩定因素。顯然，全球變化和區域衝突需要雙方以新的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另外，在東南亞和俄羅斯的亞洲金融危機後，不僅要求雙方加強在政治、經濟和金融領域的合作，而且更使他們認識到，區域集體安全唯有通過經濟的合作才能實現。儘管雙邊貿易額近年都有增長趨勢，但就雙方的潛在實力來看，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如果雙方透過 2005 年簽訂的「發展全面夥伴關係聯合宣言」以及「俄羅斯聯邦政府與東協經濟與發展合作協定」，更進一步加強雙邊經貿合作與政治對話，並在不同領域上加強互蒙其利的關係，則未來的合作關係將有更大的收穫，也更能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

對於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本文的研究架構僅以地緣經濟單一途徑來研究俄羅斯在普丁時期對東南亞政策之形成背景、主要內涵和雙邊關係。鑒於大部分東南亞國

家皆是威權主義政權，由威權體制向民主體制過渡正是東南亞政治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徵。對於俄羅斯與東南亞未來關係的發展，可以持續研究其變化的因素及影響，是否會因雙邊的政治體制轉換，而改變其現狀。另外，藉由雙邊或多邊（與東協組織）未來的反恐合作，以及俄羅斯與伊斯蘭國家的合作趨勢，對照俄羅斯未來的新政府對東南亞各國關係之態度、立場及政策，觀察其中的變化，這都是未來可以研究的方向。